

李广涛

# 百年自述

——一个合肥人的足迹

李广涛 口述  
李鲁玲 整理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L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李广涛

# 百年回眸

| 一个合肥人的足迹

李广涛 口述  
李鲁玲 整理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李广涛口述;李鲁玲,李军林整理.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 - 7 - 212 - 06587 - 4

I. ①百… II. ①李… ②李… ③李…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 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186 号

## 百年自述——一个合肥人的足迹

李广涛 口述

李鲁玲 李军林 整理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李 莉 肖 琴

装帧设计:宋文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6 字数:265 千

版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212 - 06587 - 4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前 言

---

## 合 肥 精 神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少时读宋词，姜夔“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的一曲《淡黄柳》，将八百年前本属江北的合肥小城融入江南水乡的秀色之中，至今读来还令人浮想翩跹，回味无穷。那时的合肥，想必是杨柳依依，小桥流水，让吃饱饭的文人墨客能拈花惹草，浅吟低唱，发思古幽情，诵窈窕文章。但更令我不能忘记的是九十年前受启蒙教育时读过的两句联语：“城头月冷将军庙，廓外风寒孝肃祠。”虽记不得出自何时、何人之笔，却觉得它道尽了古老合肥的沧桑与悲凉，暗合了我幼时对合肥的凄楚印象……

历史如漫漫长河，再远的便说不清楚。但值得一提的是，合肥的近现代史中似乎确有一种曾被学者论及的、谓之为“合肥精神”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当连续出现一系列人物或事件并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乃至改变了人们原来想象的历史进程的轨迹时，便有学者开始研究产生这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的、地理的诸多方

面的因果关系，并由此总结出它精神层面上的内容和影响。

可以看到：合肥人的为人行事，当然不属姜夔笔下的婉约，倒有些苏辛词派的豪放；它或有江南情怀，却更近燕赵风范；少有似水柔情，多是激烈悲壮。合肥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晚清以降，更是多难。自太平军与清兵对合肥几番争夺、兵马蹂躏、血流漂杵之时，李鸿章因洞察“江淮历来为产兵之地”而兴起淮军，遂有合肥人刘铭传、张树声乃至其后的段祺瑞发迹淝上。一时间，整个中国，竟是淮军之天下，甚至连袁世凯也是出自淮军。他们书写历史的章法迥异于中国那些以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从科举获取功名的士绅阶层，而多半是出身草莽，靠行伍立功跻身于统治阶级。对此，一代大儒曾国藩也深感意外，暗自思忖“这些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的合肥人，何以能屡战屡胜。他似乎已感悟到这些合肥人的与众不同，却对这种不同语焉不详。倒是李鸿章对他的那些个“面子比天大，乡情比地深”的老乡们看得透彻，深知其“忧国如家，视远若近”。他们其实并不乏曾国藩所说的“忧危之怀”，而只是不因忧危而止步、退让，他们总是有足够的勇气去求新求变，应对忧患。那时节，血染红顶，命如草芥；灾难弥重，思变心切。就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磨难与杀戮之中，隐约可见合肥人特立独行、持勇求变、不尚空谈、着眼现实的行事风格。至辛亥前后，西学日盛，革命党人更群起江淮，以惨烈的形式将这种精神张扬于世。小小合肥，先后有吴旸谷、倪映典、范鸿仙三位开国先驱以身殉国，因此被国民政府追赠为“辛亥三上将”。至抗战前后，合肥人王亚樵举“斧头帮”结党乡人，以暗杀方式反蒋抗日，屡造事端，震惊中外。

思想开来，无非是当时合肥的兵燹与饥荒、衰败与贫瘠造就了那几代合肥人的个性与意识。在现代进步思想尚未启蒙于国人之际，合肥人也如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各自不同的追求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在这不同的追求中凸显了合肥人的执著个性与思变意识，以至于留下了不尽相同的足迹……

合肥精神安在？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许它早已淹没在那个已离我们久远的时空，但以我百岁的经历，在我重新回首那个时空时，我似乎仍然能触摸到这种精神：遭际不幸，自该持勇思变，崇尚真理，便应执著追求。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 目 录

	前言：合肥精神 / 001
一	家世与少年时期 / 001
二	黄麓岁月 / 015
三	走上革命道路 / 031
四	在延安的日子 / 036
五	在汉口宣传抗日救亡 / 042
六	新蔡地下工作一年 / 051
七	随刘少奇东进 / 059
八	灵北一月 / 063
九	洪泽湖西岸的风云 / 066
十	奋战淮阴十春秋 / 070
十一	进军合肥，建设合肥 / 146
十二	投身于卫生教育工作——筹建安徽医学院 / 164

十三	主持省体委工作 / 183
十四	到上海搬迁工厂 / 187
十五	报考党校—规划黄山建设 / 191
十六	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日子 / 198
十七	在西安医学院工作的日子里 / 202
十八	再回安徽医学院——“文化大革命”中 / 209
十九	筹建皖南医学院 / 216
二十	主持省委文教部工作 / 220
二十一	从省人大离休 / 223
二十二	我与李一氓同志 / 229
二十三	我与傅雷先生 / 236
二十四	我的妻子吴娴 / 241
	后记 / 248



一

## 家世与少年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民国肇始。次年即废庐州府，合肥县直属安徽省。此时，袁世凯持重其北洋军阀政权，窃取革命成果，逼迫孙中山退位，刺杀宋教仁于上海，继之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合肥的革命党人或遭屠杀，或亡命海外，外强凌辱，内战又起，百业凋零，一片肃杀……

我于1914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生在合肥，属虎。我的父亲名李迺猷，母亲费氏。我姐弟三人，上有两个姐姐李广英、李广兰。现有家谱记载我们李家是1368年，即明初洪武年间被朱元璋从江苏溧水移民至合肥的，原属江宁府李姓。从那时算起，在合肥已有六百余年家族史，到我这辈已是第十七代。历史上能立祠堂修家谱，说明也曾兴旺发达过。但自我懂事起，我们这一支显然是早已家道中落，今非昔比。在我这一辈人中，整个家族里曾经“显赫”的是我的两位堂哥：一位叫李广照，字朗西，后更名李光照，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46年即以国民革命军中将衔退伍，1960年病死于宿县。另一位我称之为八哥的远房兄长李铣，字季良，原名李广达，长我十三岁，他得到一位堂叔的帮助，免试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黄埔一期学员。后官至国民革命军十九集团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

司令，1949年去台。改革开放后，我俩还互有通信。自1991年李铣去世后，我们两家就没有了联系。“文化大革命”中有造反派胡乱猜测，说我是李鸿章家族遗少，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其实生于肥东磨店的李鸿章七代前姓许，因过继给母舅而更姓为李，故他家有李许不通婚之说，其子孙辈分排序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而我们这个李姓排序是“本立道迺广，忠孝守家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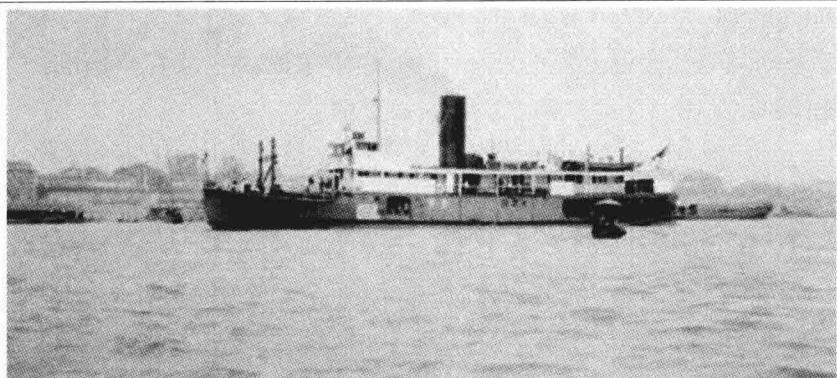
听母亲说，我祖父在我祖母去世后利用家族祠堂办了一个私塾，以教书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家有十来间草房，就在合肥西南的龚大塘（今天的三孝口永红路附近），房子四周栽有十来株果树。我未出世前，祠堂失火，祖父从此失业，终日闷闷不乐，不久便也去世了。父亲从小跟着祖父读书，十五六岁时他到合肥最繁华的东门大街（今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金城钱庄当学徒，三年后出师便成为钱庄的雇员。我四岁时，父亲便离开合肥到湖北就业，先在襄樊帮人管账，后在黄梅县衙财务科上班，不久当上了财务科长。

母亲费氏出生于肥东宋大郢，排行老大，下有四个弟妹。由于居长，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三个姨娘、一个舅舅均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舅舅自己还办过私塾，但由于染上大烟瘾，三十来岁就去世了。二姨娘文化程度最高，寿命亦最长，活到八十多岁。

父亲由于长期在外，对家庭照顾不周，与母亲感情日益淡薄，并最终在外重新安了一个新家。我十二岁时，母亲带我去黄梅找父亲。父子相见不相识，这是隔了八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第一次见到二妈（我称唐姨娘）。记得去时，母亲随身带了十几只咸鸭，连同行李重达几十斤，跋涉几百里地，这对于一双小脚而又瘦弱的母亲来说，该是多么艰难！然而母亲带着我，在黄梅只住了一个星期，便默默返回合肥，从此抑郁终身。

那时从合肥到湖北黄梅，要先自南淝河乘小船过巢湖，再到芜湖换乘江轮至安庆，下船后雇一独轮车前往湖北黄梅。当时长江上跑的大多是挑着外国旗的洋轮，不知是吃水还是码头问题，抑或是主权问题——有些地方不准这些外轮停靠。他们做生意的方法就是放慢行船速度，由岸上的小划子载客至江心客轮旁并行，再由大船上放下吊篮将客人驳上甲板，下船亦是如此，非常危险，却行之有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母亲带我自黄梅返回途中，在芜湖被一日本客轮驳下江中小划子上时，竟将别人的行李也放了下来。当时

紧张慌乱，待上岸后才发现得一意外“礼物”。打开行李，里面竟然有五只金华火腿和一些其他的食品，价值不菲。那时我懂事不多，尚为这意外之财惊喜不已，而母亲仍是闷闷不乐，凄苦之情令我至今难以释怀。



长江上英国太古公司的“金堂号”邮轮<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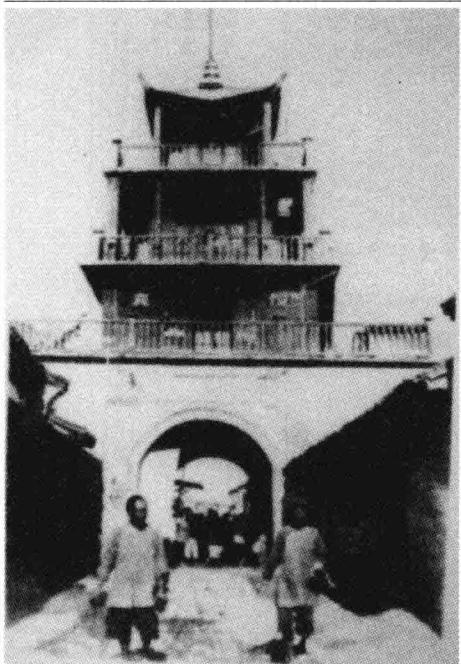
作者母亲的坟墓<sup>②</sup>

<sup>①</sup> 当时长江上跑的净是些“花旗轮”、“星条舰”。

<sup>②</sup> 作者母亲的坟葬在合肥德胜门外的陈夹街，即现今老安徽省水利厅南侧，背景依稀可见那时合肥郊外的荒凉。这张照片的左端原有作者纪念母亲的一首诗，“文化大革命”时为逃避批判将其撕去。现仍记得最后一句是：“倚坟泣母母可知？”

自黄梅回合肥以后，母亲心情一直不好，加上体弱多病，又操劳过度，终于在我十七岁时病故。当时我在张治中创办的黄麓师范读书，待我接到母亲病危消息赶回家中，母亲已离我而去。

我的家庭应该说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普通平民之家，但是，就像清末民国初年以来动乱的社会给人们的印象一样，由于家庭的变故和亲情的缺失，在我少年时期的心里，总有一种茫然和不安之感。



合肥四牌楼①

1926年秋天，我小学毕业时，父亲由于失业（县长因经济问题出逃，他被牵连），携二妈回到合肥。由于父亲反对洋学堂，我又进入一家私塾读书。该私塾设在四牌楼东面一个名叫范家桂的大户人家内，私塾先生也是范家请的。我在他家读了一年半的私塾，就在这期间，合肥战火又起……

那是1927年春，蒋介石背叛革命，宁汉分裂，北伐受挫，北洋军阀趁机南下。是年农历三月，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率部十万余人围攻合肥，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则团结合肥军民顽强固守。当时合肥三河商会筹粮万石以资军用；大蜀山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用以修筑工

事；又从前淮军将领的后裔周、刘、张各圩户借来子弹四万发。战火持续两月有余。记得张宗昌还用飞机向城内投掷炸弹，让大多数合肥人第一次见到飞机。合肥城外从东郊二十埠，至七里站、三里街、坝上街和东门大桥一带均发生激烈交火。至四月下旬，李宗仁部第七、十两军驰援合肥，合肥驻军

① 合肥四牌楼，位于今长江路与宿州路交叉口。而时下被人们称为四牌楼的长江路与徽州路交叉口，即现百货大楼、新华书店所在地是当时的“范巷口”。此四牌楼是当时合肥最高建筑，原是木质结构，亦称“奎星楼”。故合肥当年有“四牌楼的菩萨——亏心（奎星）”的歇后语。1929年遭火焚后又重建为砖石结构，改称“马、王二公祠”。1938年被日军炸毁。

大举反攻，直鲁军终于溃败向皖北逃窜，合肥近郊农民亦奋勇参战追杀敌军。张宗昌的一支白俄骑兵队在双岗一带被守城军民击溃，当时我也随很多市民在北门大桥看到众多“老毛子”横尸桥头。后来听说是合肥城外的百姓假称劳军，以酒灌醉了白俄骑兵，再趁机斩杀……这场战争终因马祥斌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及合肥军民的顽强坚守，加之得到北伐先遣司令王金韬三千人马的支援而取得了胜利。合肥县城又一次如史上传说的那样，成了“铁打的庐州府”。马祥斌、王金韬两位将领因此深得合肥人民的爱戴，其后二人遇难，合肥人遂在城中心四牌楼建立“马、王二公祠”，以为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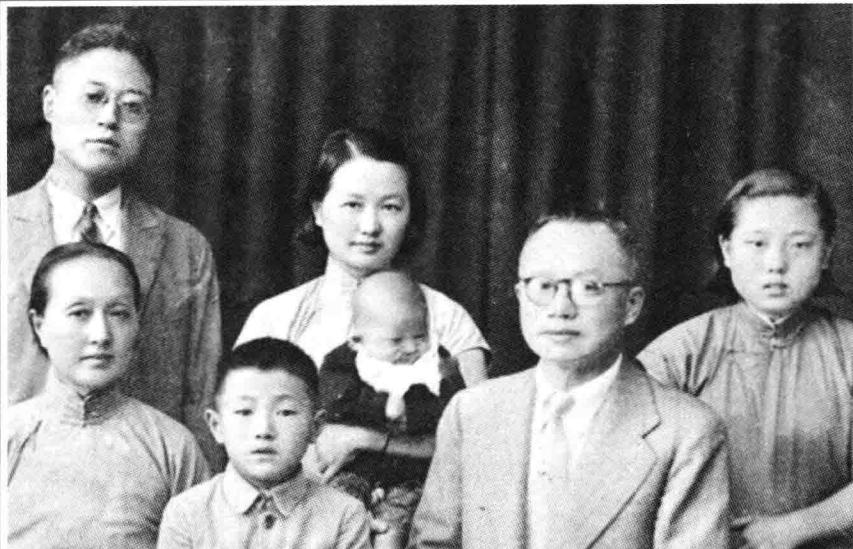
我就在这动乱的世事中背诵“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今天孩子们说我读得不甚了了，自然是事出有因。



1928年，我十四岁。在这期间，我的二表舅（因与我二姨娘姑表联姻，故也是我的二姨父）毛北屏<sup>②</sup>从美国回到安庆，当上了安徽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

<sup>①</sup> 即今日之长江路中段。

<sup>②</sup> 毛北屏，安徽合肥人。美国琼斯维利亚大学毕业，密歇根大学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苏省文史馆工作，皖籍知名人士。



作者的二姨夫毛北屏、费芝英夫妇一家

安庆是安徽当时的省会，是安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1928年夏，我考入该校，和同班同学史克荣、卢××以及高年级同学陶有恒、李儒尧、杨崇德、徐良骥等交好。高年级的这几个同学都是合肥人，受国民革命军北伐影响，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因此对我影响较大。而我的同学卢××因长我几岁，当时已是共产党安徽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支部的负责人。也就在这期间，因喜读左翼作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等进步小说，我萌生了追求进步的意识。1928年年底，在安庆，我第一次参加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全市大中学校学生的反蒋示威大游行。此次示威游行的起因是省立第一女中举行校庆十六周年恳亲会，并举办文艺演出，刚创立不久的安徽大学的男学生翻墙头进入女中看演出。第一女中不能容忍，停电罢演，引发了安大学生与第一女中校长程勉的冲突。程勉一方面指责安大预科主任兼文法学院院长、主持安

大校务的刘文典<sup>①</sup>治学不严，一方面电召公安局派来军警鸣枪弹压，以致骚乱愈烈。

此时适逢蒋介石来安庆视察，闻讯召见安大学生代表，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刘文典大加责难，斥责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刘对蒋只称先生，不称主席，没几句话即发生冲突。蒋指刘怒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则厉声反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关了起来。此事激起安

庆大中学校学生的公愤，在安庆的共产党人伺机组织学生举行了反蒋大游行。记得我们在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安徽省党部门前振臂高呼“打倒程勉，释放刘文典”、“保障人权”等口号。此事轰动全国，促成皖省各界人士联名援救，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民国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等知名人士亦予“力保”，逼迫蒋介石以刘“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在收入《二心集》的《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被关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又借此事挖苦了曾称溥仪为“皇上”、蒋介石为“主席”的胡适之博士。刘文典获释后去看望章太炎，太炎先生抱病挥毫，书写对联“养生



刘文典

<sup>①</sup>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著作等身。

未羨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以赠，对刘文典不惧强暴的书生气节大加赞赏。这一连串的佳话在当时安徽的学子中口口相传，至今令人难忘。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感叹安徽无大学者可任副省长，我曾向他推荐刘文典，曾希圣当即派一秘书长前往云南交涉，但云南省亦以“当地严重缺乏人才”为由婉拒，未能促成此事，实为一大遗憾。

刘文典能化险为夷，我却身份卑微，无此好运。先因参加这次学潮被学校另眼，后又因帮中共地下党开会酿成事故而遭处理。那是学潮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时任共产党支部负责人的同学卢××要在校内开会，我想帮助他们，便借我二姨父是校长，我能自由进出校长室之便，私自去校长室推上电闸，方便地下党开会。没想到安庆电压极不稳定，待开完会后我又忘拉下电闸，导致学校上百盏灯泡炸毁，造成重大事件。此事很快追查到我身上，我当然不能说出是受卢××指使，只好另找托辞。当时我二姨父虽是校长，但身在德国，也无法助我。最终我被学校勒令退学，这是我懂事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被勒令退学后，我只好孤身一人，悻悻然回到此时在蚌埠经商的父亲家里。从此我失学在家，为后母带孩子，做家务，这对于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来说是很难熬的。由于在学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回家后又感受不到亲情，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我心中的茫然变为冲动，不安变为奋进，总想寻机离家出走。

1929年冬，国民党中央军校在蚌埠招兵。得此消息，我自认为当兵是我唯一出路，便不辞而别，离家出走。报名当天，无意之中碰到了招兵的负责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sup>①</sup>。唐是合肥肥西丰乐人，保定军校毕业，少将军衔。唐一听我是合肥口音，且有一定文化，便留我在招兵处协助写花名册。十来天后，招兵结束，我便随唐来到南京，被编在教导总队特务营当兵，驻守在中央军校校本部东面的炮标。我因小有文化，直接当

<sup>①</sup> 唐光霁，生于1888年，字逸樵，肥西名人唐启尧长子，保定军校二期毕业。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李宗仁1948年《五修唐氏宗谱并序》称其抗战胜利后“乞归田里……现领巢警总队”）。其后下落不得其详。

了上等兵。当时军校教育长是安徽巢县人张治中<sup>①</sup>，而我所在特务营的营长张本禹<sup>②</sup>是张治中的三弟，其妻是唐光霁的妹妹，张治中早年又曾得到过唐光霁的父亲唐启尧<sup>③</sup>先生的栽培。



张治中出身贫苦家庭，所受的教育基本是传统教育。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张治中对蒋介石则竭智尽力，忠心耿耿。蒋介石定都南京后，便开始筹划建立一所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军校，以取代黄埔和武汉军校的地位。经过紧张的筹备，1927年11月，该校正式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从中不难看出蒋对张的信任。

1930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因为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其邻近地区进行，所以史称“中原大战”。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教导第二师师长，率部参战。教导总队为

<sup>①</sup> 张治中(1890—1969)，原名张本尧，字文白，巢县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国民党上将，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曾三上延安，是一位从未与共产党打过仗的“和平将军”。

<sup>②</sup> 张本禹，抗战烈士张治中三弟。是作者所在特务营的营长，后任国民党十三军四师十二旅副旅长。1937年8月，在南口居庸关指挥弹药卸运时遭日机轰炸牺牲。同年10月公葬于巢湖银屏山。时年三十八岁。

<sup>③</sup> 唐启尧(1865—1958)，谱名唐远华，字冀庭，合肥肥西丰乐镇人。出身淮军，为袁世凯部将。民国后任国民政府参议院参议，肥西巨富。新中国成立后得张治中照顾，闲居北京直至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二师的一个旅的建制,我所在的特业教育班是一个排的编制,任务是为张治中做内勤、警卫,我任班长。是年4月30日,双方在安徽砀山打响前哨战,5月中旬起开始大规模接触。我所在的特业教育班即随张治中从南京乘火车到达河南兰封(今兰考)附近的野鸡岗,下车后即赶往菏泽前线。6月始向杞县、太康进发。由于蒋介石指挥有误,险被冯玉祥重兵包围,教导第二师奉命掩护撤退。按说教二师有十一个整团建制,炮兵团、骑兵团、工兵团一应俱全,实力当属强悍,但毕竟建成不足数月,且出师仓促,战斗经验不足,故遭受惨重伤亡。然而首战即能掩护大规模退却而未被击溃,已说明张治中指挥有方了。蒋介石视张治中为嫡系,亦为之扼腕,故向张治中暗示,先让杂牌军抵挡,不到万不得已不必死打硬拼。张治中性属耿直,当马鸿逵贺村被围时,张又派兵接应,助马突围。马突围后就溜之乎也,不顾张部的死活,张部只好撤退。事后,马鸿逵又向蒋介石告状,指责张部接应不力,马家军孤军作战,以致丢失贺村。蒋随即对张大发脾气,但不是责怪他擅自撤退,而是说:“要你控制在后面,为什么打?”张治中这才弄了个明白,一是知晓了马家军这种地方军阀的滑头,二是对蒋介石亲疏有别、保存实力的心性有了一个了解。随着战局变化,教二师越打越好,8月31日攻占民权县城,9月13日进攻兰封,30日克兰封,10月3日占领开封,继续推进,中原大战告终。此役双方动用百万军队,伤亡人数逾三十万。战事结束后,我随部队又回到了南京中央军校。此时我刚满十六岁。

这段时间,我目睹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斗争,并亲身经历了军阀间的大小混战。士兵们伤亡无数的惨状,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在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1931年9月19日,时任中士班长的我,正逢值夜班。天快亮时,唐光霁开完会回到总部,记得他在晨曦中伫立良久,一言不发,半晌后他告诉我,“昨天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军的北大营”。直到今天我仍能记得,他悲伤地说:“小老弟,我们要亡国了。”唐光霁虽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而我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干部,我们的信仰不同,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是作为帮助我走进社会的领路人,他那忧国忧民的神情、那一句普通的话语,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刻骨难忘。